

全国党员干部读书活动专家指导委员会推荐

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指导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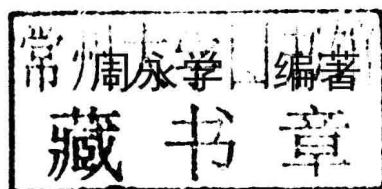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知识百题

下 册

兴华智源管理科学研究院
《组织部长参阅》编辑部

中共党史知识百题



中国 北京

兴华智源管理科学研究院

《组织部长参阅》编辑部

责任编辑：吴佳蓉

版式设计：一 木

责任校对：张 炎

封面设计：赵楚楚

中共党史知识百题

ZHONGGONG DANGSHI ZHISHI BAITI

组织编撰：《组织部长参阅》编辑部

编 者：周永学

出 版：兴华智源管理科学研究院

通讯地址：北京91-019信箱 邮编：100091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225千字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 价：39.00元（上下册）

目 录

63.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33)
64.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	(134)
65. 庐山会议	(136)
66. 七千人大会	(139)
67. “文化大革命” 及其发生和发展的原因	(141)
68. 党的九大	(149)
69. 党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51)
70. 毛泽东“三个世界” 理论的提出和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153)
71. 党的十大	(155)
72. 1975年的全面整顿	(157)
73. “四人帮” 的覆亡和“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	(159)
74. 党的十一大	(160)
75.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63)
7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65)
7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67)

-
78. 党的十二大 (169)
79. 党的十三大 (172)
80. 邓小平南方谈话 (174)
81. 党的十四大 (176)
82. 邓小平理论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178)
8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 (180)
84.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 (181)
85. 党的对台工作八项主张 (183)
86. 香港回归祖国 (184)
87. 澳门回归祖国 (185)
88. “三讲”教育 (186)
8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189)
90.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190)
91. 党的十六大 (192)
92. 胡锦涛率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赴西柏坡学习考察 (194)
93.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196)
94.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199)
95.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203)
96.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 (205)
97. 党的十七大 (208)
98. 十七届四中全会 (213)
99.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 (220)
100. 十七届五中全会 (226)

63.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相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党所提出的旨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指导性纲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密切相关的，三者并称为“三面红旗”。可以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实践，而总路线则是理论上的概括和指导。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大跃进”运动正方兴未艾。它的基本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虽然带有明显的“大跃进”痕迹，但是它的基本点是正确的。当时规定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的基本要求是调

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再加上在宣传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等等。于是，盲目求快，成为总路线中压倒一切的内容，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64.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的尝试。实践证明，这次尝试是不成功的。

整风反右斗争以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一些工厂、农村出现了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另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深受鼓舞。苏联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也不甘落后，提出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这年冬天，各地纷纷召开党代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掀起了一个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

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一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准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建设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推向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大跃进”高潮中，一些地方的农业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进行了生产大协作，提出是否可以把农业社合并为大社。1958年3月，党的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会后，有些地方办起了人民公社。8月6—9日，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山东历城县北园乡，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口号。8月17—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迅速开展

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 74 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 26000 个人民公社，涵盖了全国农户的 99% 以上。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这实际上超越了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实践证明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公社还采取各种措施向共产主义过渡，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失误，但这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原因。客观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了解不够。而主观上，一连串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太好形势，容易使人产生盲目乐观和骄傲自满情绪；全国人民急切盼望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希望一步跨入未来美好社会。同时也应当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全国各地建起了大量农田水利工程，形成了一定工业生产能力，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65. 庐山会议

1959 年 7、8 月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连续召

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这就是著名的庐山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继续纠正“左”倾错误。这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的继续。

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指出的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等19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与会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意见不一致。彭德怀曾多次发言，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错误提出中肯而又严肃的批评意见。7月10日毛泽东布置讨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并说会议预计可能7月13日结束。彭德怀于是在7月13日晚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集中陈述了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希望真正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党的工作。他的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肯定1958年的成绩，列举了工农业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人民公社化中问题正在得到纠正，大炼钢铁运动“有失有得”；第二部分是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其中讲到建设工作中“比例失调”，引起了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并“具有政治性”。认为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缺乏完整的经验，对建设工作不熟悉，对建设的规律认识不深，主观方面是“浮夸风普遍

滋长”，“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强调指出，纠正这些“左”的问题比克服右倾保守要困难些，因此需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信中还指出，总结经验教训为的是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他还再三强调，信是供主席“作参考”的。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全体与会同志。小组讨论中，有些人说这封信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有埋怨泄气情绪。也有许多人表示基本同意信的内容，认为提出的意见是好的。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做了系统分析。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近期以来，全党一直在努力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要求进一步纠“左”，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同时，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同国际上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认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下，右倾已成为当前主要危险。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严肃批评彭德怀，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悲观性”的表现，是“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并对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

失有得”等观点逐一加以批判。于是会议的主题，一下发生了180°的大转向，由纠“左”变成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从8月2日起，在庐山又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集中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并对彭德怀等同志作出了错误的结论，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将这四位同志分别调离担任的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并在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66.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故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会议主要是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

的认识，加强团结统一，以保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这是八大以来我党历史上一个重要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集中讨论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围绕报告提出的 12 条成绩、4 条主要缺点和 16 条基本经验，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意见。1 月 27 日，刘少奇就书面报告作了讲话。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主要有：一是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严重不协调；二是许多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混淆了全民与集体两种所有制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变化过多过急，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集体所有制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错误；三是对国家建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下放过多，有分散主义倾向；四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和农业生产的困难。他认为产生以上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很不够，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

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多、要求过急的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民主的错误作风，也妨碍了党及时尽早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讲话指出，全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整工作。

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健全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并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全党要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知识，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代表们热烈讨论了这一讲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加强团结。会议还提出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进一步统一了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动员全党抓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对1962年的工作做了部署。

这次会议虽未能彻底解决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初步纠正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为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起了积极的作用。

67. “文化大革命”及其发生和发展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

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

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

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